

# 2009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

侯振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 北京 100102)

2009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共出版专著60余部,发表论文800余篇,现分类略述于下。

## 一、政治

政治制度。吴丽娱《下情上达:两种“状”的应用与唐朝的信息传递》(《唐史论丛》11辑)分析了唐代上行文书中奏状与申状的上达方式及其传递功能,并考察了它们在唐后期所发生的变化。戴建国《唐宋大赦功能的传承演变》(《云南社会科学》4期)认为入宋以后,唐代大赦的申禁职能被传承了下来,但功能有所减弱,这与宋代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强化有关。赵贞《唐代的天文观测与奏报》(《社会科学战线》5期)论述了唐代的天文观测机构太史局的职掌,指出天文奏报形成了一种对皇权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叶炜的专著《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研究了隋唐胥吏阶层的形成和职位管理。卢向前、熊伟《本阶官位形成与演化——北周隋唐官职研究》(《浙江大学学报》1期)认为本阶与职事官勾连,其进位授阶意义强于其他品阶。在北周隋唐不同历史阶段,本阶经历了功能混融、层级分化与文武分途的过程。这方面的研究还有韩昇的《周隋嬗替中的知识官员及至唐初立国理念的演变》(《文史》第1辑)。

王建峰《唐后期刑部尚书职权衰落探因》(《史学月刊》5期)从职权旁落、迁转与任期、受制于宦官几个方面探讨了唐后期刑部尚书职权衰落的原因,并指出刑部侍郎的地位在不断提高。王颜、杜文玉《论唐宋时期的文思院与文思院使》(《江汉论坛》4期)论述了文思院使从唐代的内诸司使,至宋代成为西班使臣,再到明代沦落为低级职事官的演变历程。李全德的论著《唐宋变革时期枢密院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研究唐五代枢密院制度的演变,注意到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张国刚《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演变》(《北京大学学报》5期)认为,中唐以后乡村基层组织变化的基本方向是“县—乡—里”让位于“县—乡—村”结构,这与乡和村的人口扩张有关。张玉兴的专著《唐代县官与地方社会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从县级行政的角度来透视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关系。陈明光《唐朝的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厦门大学学报》2期)指出唐前期郎官出使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安史之乱后,中央从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纳入地方监察系统。张卫东《唐代刺史的任期与特点》(《中州学刊》4期)认为南方诸州尤其那些所谓富庶之州的刺史,在唐后期普遍存在着任期不够的问题,反映了唐代中后期南方州郡地位的上升。

政治人物。张洁、赵海滨《贞观治世有无酷吏》(《历史教学》4期)认为贞观时期亦存在酷吏。刘顺《唐前期的文儒与吏能之争》(《安徽史学》5期)认为吏能与文儒是本着不同施政理念而边界模糊的两大政治集团,其分歧实际来自对建设仁政途径的不同理解。陈弱水《唐代长安的宦官社群》(《唐研究》15)讨论了宦官与军人的社会关系、地缘关系以及宦官群体内部的精神信仰问题,指出:关中军人子弟是第一代宦官的主要来源,宦官的养子多取两个字的名字,不再做宦官的养子多变为军人。金滢坤《论中晚唐进士朋甲与官僚朋党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6期)认为自宣宗以来,牛李党争渐息,宦官控制了朝政,进士中芳林十哲依靠宦官势力为其登科创造条件,正是当时宦官专政在选举方面的表现。

政治事件。雷闻《唐长安太清观与〈一切道经音义〉的编纂》(《唐研究》15)研究了《一切道经音义》的编纂者史崇玄如何组织写作班子,及为何受玄宗之命编修此书。通过考察两宫学士的身份,揭示了《音义》编纂的政治背景:安抚太平公主党羽,探其情报。李丹婕《从宫廷到坊里——玄肃代三朝政治权力嬗变分析》(《唐研究》15)指出,玄宗后期地方节度使在京扩张势力,尤其是安禄山在长安有自己独立的政务场所,为其发动叛乱提供了条件。陈正奇、穆渭生《唐后期陇右失陷与京畿安全危机述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辑)认为陇右监牧的丧失导致“马政”剧衰,若干羁縻府州及其部落兵损失,致使唐朝骑兵软弱,军力下降,综合国力严重削弱。

地方政治。薛政超《唐末五代湖南割据势力移民考论》(《历史教学》4期)考察了唐末五代迁入湖南的割据政权,指出这种移民与当时大分裂、大动乱的背景密切相关。刘影虹《论唐初高凉地区的正州化——以冯氏家族个案为中心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以冯氏家族所控高凉地区的正州化个案为例,探讨了唐朝在南方边疆改羁縻州郡为正州的过程。陆离、陆庆夫《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及其与唐朝中央政权关系管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考察了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及其与中原王朝在政治、礼仪等方面的关系。

教育科举。贾丹丹《诗赋或策文的选择——重探武则天的科举态度》(《江淮论坛》2期)对武则天倚重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她主要倚重的是制举和试策。蒋方《唐毛诗博士考述》(《河北师大学报》3期)认为毛诗博士缘于文宗时的五经各设博士,是中唐以后国家教育与科举考试推行改革的产物。刘琴丽《中晚唐河北举子研究》(《史学集刊》4期)指出,河北地域(特别是幽州镇)在中晚唐时期涌现出大量士人,科举成为他们出入河北藩镇的合法渠道,并成为促进河北地域汉文化发展的制度因素。

## 二、经济

财政制度。李锦绣《隋唐审计史略》(昆仑出版社)从审计机构、审计法规、审计活动等方面分析了隋唐时期审计制度的特点。陈明光《唐朝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监督述论》(《宁波大学学报》2期)认为,唐朝前期实行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财政管理体制,肃、代时期财权严重下移,其后以实行两税法为契机,建立了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定额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他的《“检田定税”与“税输办集”——五代时期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论稿之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指出,五代时期中央明显强化了对地方政府“检田定税”及配税权的干预,多

次制定“省限”及对地方官吏“税输办集”与否的奖惩制度,都是在财政上重振中央集权权威的措施。牛来颖《论唐长安的营修与城市居民的税赋》(《唐研究》15)考察了唐长安地子用于营缮建筑和充当税赋的情况。张荣强《〈新唐书·食货志〉所载“手实”“乡帐(计帐)”关系考》(《史学史研究》4期)认为计帐是依据手实编造的,修成时间以手实最早,计帐次之,户籍最晚。吴树国《税制变迁与唐宋之际户籍管理的调整》(《唐都学刊》4期)认为唐宋之际征税对象由人丁变为土地,使户籍在税收中的地位开始削弱,在户籍编制和户种设计上体现了以土地为中心的新特征。耿元骊《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论纲》(《东北师大学报》5期)认为“均田制”在唐代并不存在,更不是唐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实践,而仅为一种学术观点。唐宋土地制度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转变,其根本性质一致,唐宋之间是自然性的延续而不是断裂性的变革。张安福《税制改革对唐代农民产业经营和日常生活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7期)认为由于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相对松弛,农民劳动力资源逐步成为流动的社会财富,农民日常生活和家庭结构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孟宪实《新出唐代寺院手实研究》(《历史研究》5期)考察了吐鲁番新出寺院手实的具体情况,指出其与世俗户籍管理制度有密切联系。

经济活动。罗彤华《唐代民间借贷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研究了唐代的资金供需变化情形,以及政府与民间的融资渠道。张永帅、唐亦功《论唐长安住宅所有权的延续与转移》(《陕西师大学报》5期)认为,从所有权角度可将唐长安住宅分为官舍和私宅,二者之间可以转化,而私宅的所有权也可以通过买卖、赠与以及掠夺的方式发生转移。明成满《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厨田”》(《中国农史》2期)指出,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寺院中的“厨田”是寺院地产的总称,梁课和碓课是寺院地产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陈大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僧与尼寺/尼贫富状况的比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期)指出,无论是宗教收入还是世俗收入,尼寺都不及僧寺,女尼也不及男僧。

农业。李伯重的专著《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提出了唐代江南农业变革的观点,与学界关于宋代农业革命的传统看法不同。唐智燕《“赁田”与“租田”区别之管见》(《史学月刊》3期)否定了以租价支付时间来区别赁田与租田的说法,认为吐鲁番文书中的“夏田”即前代的“假田”,后来“夏田”的说法被“租田”取代。杜文玉《论五代十国时期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趋势》(《陕西师大学报》4期)认为五代十国时期的经济作物种植和水产养殖业都出现了生产规模扩大、品种增多、技术改进、专业化程度提高的发展趋势。苏金花《唐五代敦煌水利管理论略》(《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论述了敦煌地区的水利管理和税制变革对其产生的影响。

商业。肖建乐《唐代城市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一书研究了唐代城市居民结构的变化、工商业形态的变化及商品货币关系的变化,城市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关系的变化。张雁南的专著《唐代消费经济研究》(齐鲁书社)则主要关注唐代的消费活动,全面研究了唐代各个阶层的消费观念、行为和现象。陈磊《从〈太平广记〉的记载看唐后期五代的商人》(《史林》1期)研究了《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大商人、中层商人及小商贩的经营活动和他们在唐人心目中的形象。宁欣《文本的阐释与城市的舞台——唐宋笔记小说中的城市商业与商人》(《唐研究》15)依据小说中的商人形象,探讨了长安商业社会中的商人身份转化,经商背景的非经济因素及商人的的人文风貌。(日)斯波义信《商业在唐宋变革中的作用》(《文史哲》3期)

从交通运输、商业制度、市场区域等方面的变化探讨了唐宋间商业的变革。

手工业。张剑光、陈巧凤《隋唐五代江南造船业的发展》(《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期)论述了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地区造船业特别是战舰制造繁荣的情况及其原因。曾维华《唐“开元通宝”钱“仰月纹”述考》(《江西社会科学》5期)认为唐“开元通宝”钱背面的“仰月纹”与指痕无关,而是一种兼具装饰和炉别的记号。周尚兵《隋唐时期山东手工行业的特点》(《山东师大学报》5期)指出隋唐时期山东手工业形成了盐铁生产、药材制售、印染纺织、石器制作、船舶制造等多条生产链。

畜牧业。贾志刚《隋朝畜牧成毁初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5期)指出隋朝畜牧业曾盛极一时,但由于过分征用马畜致使牧源枯竭,畜牧资源配置不当、战乱频繁破坏了畜牧业生产所赖以存在的安定环境,最终导致隋代畜牧业的大衰退。尹伟先《隋唐时期西北地区畜牧业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3期)从经济地位、政府政策、牧场、牲畜及牧民几个角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隋唐时期西北地区的畜牧业。杜文玉《五代时期畜牧业发展状况初探》(《唐史论丛》11辑)则主要研究了五代时期的畜牧业发展情况。

### 三、思想文化

思想。汪仕辉《论中唐之际忠君观念的提升》(《理论月刊》6期)认为中唐之际忠君观念得以显扬和提升,“忠”取代“孝”上升为核心政治道德,这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普遍皇权”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郭文庭、周伟洲《论魏徵的民族思想及历史作用》(《唐都学刊》6期)评价了魏徵的民族思想对于形成唐初良好民族关系的作用。

方丽萍《从贞元士人财富观的变化看唐宋变革》(《暨南大学学报》4期)认为贞元时期“士”的构成、价值观念以及人生追求均与唐前期有比较大的差异而与宋代有许多相似之处,由此推论唐宋变革在唐德宗贞元时期表现得比较突出。陆敏珍《论韩愈〈师说〉与中唐师道运动》(《社会科学战线》1期)探讨了以韩愈为代表的士人与师道运动的关系以及唐代师道运动的局限性,指出师道运动与国家政策、社会制度的真正结合,要等到北宋庆历时期。

刘天琪《隋唐“讖语”墓志及相关问题》(《唐都学刊》4期)认为墓志中的“讖纬”是葬家利用讖术所具有的心理影响来保护墓葬不被盗掘的一种方式。石玉秋《论唐代科举取士中儒家思想与非儒家思想之争》(《湖北社会科学》6期)认为唐代科举出现了“以文取士”还是“以德取士”之间的分歧,究其实质就是儒家思想与非儒家思想之争。杨逊《唐代的性善说》(《湘潭大学学报》1期)研究了唐代性善思想的提倡和传播情况。

文化。肖占鹏、李广欣的专著《唐代编辑出版史》(南开大学出版社)探讨了唐代的国家编辑出版管理制度、政府的编辑活动、士人的编辑出版活动、编辑活动的继承与创新、图书传播等内容。僧海霞《唐宋时期敦煌药酒文化透视——基于药用酒状况的敦煌文书考察》(《甘肃社会科学》4期)探讨了敦煌文书中记载的药酒的命名、酒的药理作用、药酒的用法及用量、药酒的保存等问题。蔡定益《从“茶山”一词管窥唐宋茶史与茶文化》(《农业考古》2期)考察了文献中不同“茶山”之所指,及这些地区与朝廷贡茶之间的关系。刘后滨《“瑟瑟”考——唐诗语汇与外来物品》(《文史》1辑)结合文献所记载的作为宝石的“瑟瑟”在唐代域内和周边民族的

使用情况,探讨了“瑟瑟”在唐诗语汇中的词性变化。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兰州学刊》11期)认为,唐代士人继承了以“浮散”和“粗疏”为特征的南北朝文化,同时在发展中消解了固有的家族的主导作用,使得文化的发展严重依赖于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一旦失去国家的束缚,文化就会走向瓦解。曾振宇、崔明德《李淳风“军气占”考论》(《历史研究》5期)指出李淳风的《乙巳占》含有天象制约人事和皇权的人文关怀。

郭可愚《〈大唐西域记〉与唐代中原、西域的文化互动》(《中州学刊》3期)分析了《大唐西域记》所反映的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以及中原人士根据该书的记载而新创作的文化元素,从中体现了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互动。韩香《联珠纹饰与中西文化交流——以西安出土文物为例》(《唐研究》15)则通过丝路上联珠文饰的变化,探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吴艳春《从和田布扎克彩棺看唐——五代长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新疆师大学报》3期)对唐五代时期佛教与道教文化碰撞交流,尤其是佛舍利棺槨上的中国化变异进行了探讨,并指出这种变异也影响了西域和田地区。另外,陈明《佛教双语字书与隋唐胡语风气》(《四川大学学报》2期)研究了唐代因佛经翻译和求法活动而引起的学习佛教词典、梵汉字书、佛经音义等著作的风气。

#### 四、礼制法律

礼制。雷闻的专著《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三联书店)全面研究了隋唐制度、宗教、社会与国家祭祀之间的关系和地方祭祀的实践活动。游自勇《礼展奉先之敬——唐代长安的私家庙祀》(《唐研究》15)研究了唐代私家庙祀庙名的区分、立庙与赠官的关系、祔庙过程中皇权的介入、唐《假宁令》关于府庙享庙给假的规定等一系列问题,指出这些都是皇权的衍生物。朱溢《唐至北宋时期的大祀、中祀和小祀》(《清华大学学报》2期)研究了唐宋时期的三祀制度,指出这一时期祭祀的等级性逐步落实到斋戒、祭品和祭祀人员等环节上,更多的吉礼仪式有了祭祀等级。(日)金子修一《唐代长安的朝贺之礼》(《唐史论丛》11辑)论述了睿宗朝以前朝贺之礼的实际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长安年间举行武后元日朝贺的意义。(日)妹尾达彦《长安:礼仪之都——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素材》(《唐研究》15)考察了圆仁在长安时所目睹的一系列礼仪活动,这就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礼仪在时人心目中的印象。赵玉平、郇朋飞《唐五代敦煌“雩礼”考》(《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期)认为敦煌地区的“雩礼”活动因其所处的独特自然、经济、政治及文化环境,在唐代礼制大背景下,表现出了儒、释、道、袄杂糅的独特风格。

法律。张先昌、程柳《从隋开皇〈田令〉的修订增补看诏制敕与制定法的关系》(《郑州大学学报》6期)指出,皇帝的诏、制、敕主要补充了成文法之不足,但也可以修改或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条款。徐志卿《唐故事为“不成文法”说质疑》(《史学月刊》7期)认为唐代“故事”里含有一部分法律法规,尤其是存在大量的式,并非全是不成文法。

戴建国《唐宋时期判例的适用及其历史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期)认为,唐之《法例》所载案例,是中央司法机关灵活运用法律原则,将之适用于疑难案例而予以裁定的判例。他的《唐格条文体例考》(《文史》2辑)又对唐格的体例作了研究。王玉杰《盛唐刑事政策探析》(《河南师大学报》1期)探讨了“刑罚世轻世重”、“恤刑慎杀”和“矜老恤幼”思想在刑事立法

与司法中的运用。石冬梅《唐代“司法三司”新论》(《唐都学刊》5期)辨析了三司受事和三司推事的区别。陈玺《唐代亲属代诉现象考论》(《西北大学学报》6期)认为亲属代诉现象是儒家“宗族一体”理念在诉讼领域的具体彰显,是唐律礼法融合的重要体现。

## 五、社会

社会组织。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民间结社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他另有《试论唐代西域的民间结社》(《西域研究》1期)通过研究吐鲁番和古代龟兹出土的汉文文书,对唐代西域地区的民间结社进行了新的探讨。郑杰文《新发现的〈三皇遗训〉与唐代瞽者会社》(《文献》3期)根据民间收藏的《三皇遗训》中的相关记载探讨了唐代瞽者会社在唐代各种结社中的特点和瞽者会社地位的历史变迁。

社会生活。黄正建《〈天圣令〉所附唐令中有关社会生活的新资料(上)》(《唐史论丛》11辑)根据《天圣令》所附唐令中不见于传世典籍的新材料,研究了唐代衣、食生活史中的新问题,体现了《天圣令》对唐史研究的价值。朱红《外来之风与本土习俗:唐代上元燃灯之源流及其嬗变》(《史林》3期)集中探讨唐代正月十五燃灯习俗所受本土和外来因素的影响,考述了与佛教相关的正月十五节物灯轮。成荫《日常生活视野下的唐宋都城变革——以节日游乐社会环境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指出,节日游乐社会环境主要因素的历史变迁表现为官方公共服务日渐强化、生活服务业不断进步。

宁欣《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文史哲》6期)从城市转型的角度研究了唐宋时期都城中居民群体的演变。她的专著《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对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关注》(商务印书馆)亦研究了唐宋都城的社会变迁,以及都城空间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人口流动对都城经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王涛《唐宋城市保护神二元格局的形成与分布》(《社会科学战线》5期)认为毗沙门天王信仰形成之后,主要分布于北方城市,而城隍神主要分布于南方城市之中。赵玉平《敦煌壁画“雨中耕作图”与唐五代赛袄祈雨活动》(《新疆艺术学院学报》3期)指出莫高窟第23窟“雨中耕作图”实为一幅粟特文化特征鲜明的“赛袄祈雨图”,表现的是《妙法莲华经》“序品”之内容,并由此探讨了唐五代赛袄祈雨活动的特点。

杨发鹏《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僧尼人口的增长及原因探析》(《西北人口》2期)探索了唐五代敦煌地区僧尼人口的变化轨迹,并具体分析了其增长的社会与政治原因。么振华《唐人离婚探析》(《首都师大学报》3期)指出,唐律离婚条款与实例中出现和离,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男子依然具有婚姻的主导权。

女性。陈弱水《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广西师大出版社)研究了唐代妇女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对唐代的家庭样态也颇有揭示。胡敏《初唐皇室女性崇男心态浅析》(《咸宁学院学报》1期)提出了唐代女性崇拜男性这一命题。岳永逸《眼泪与欢笑:唐代教坊艺人的生活》(《民俗研究》3期)考察了教坊艺人的身份地位、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特别关注了女艺人所结成的香火兄弟。王晓娟《从〈北里志〉看唐末长安歌妓的生活》(《兰州学刊》10期)研究了唐末长安歌妓的来源、家庭构成、技艺训练、居住场所、身份类型、交往对象、人生归宿等方面。路学军《儒佛兼修与唐代山东士族女性的家风演进——以唐代墓志为

例)(《首都师大学报》5期)指出,山东士族女性在保持家风的同时信仰佛教,但同时也因信佛而导致家风变异。

家族。周扬波《从士族到绅族——唐以后吴兴沈氏宗族的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第一章研究了唐五代吴兴沈氏士族的升降。张葳《隋唐赵郡李氏家学家风略论》(《西南大学学报》4期)认为,赵郡李氏的家学家风主要分化为儒家伦理和文辞诗赋两种,它们因为在不同方面与现实政治相契合而有利于一部分赵郡李氏保持其政治社会地位。童岳敏《唐代文学家族的地域性及其家族文化探究》(《人文杂志》3期)研究了唐代文学家的地域分布和家学渊源。

## 六、地理

长安学。长安学是近年兴起的一项新课题,《唐研究》第15卷以“专号”的形式结集了一批相关成果,足见对其相当重视。《光明日报》4月21日第12版还设置专栏“都市空间与文化:隋唐长安研究的新视野”,发表了四篇相关文章:荣新江《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王静《唐代长安的空间与社会流动》、陈昊《隋唐长安的医疗与社会空间》、朱玉麒《长安都市空间与唐人小说的场景还原》。

荣新江《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唐长安城的甲第及其象征意义》(《中华文史论丛》4期)从门第观念对于城市建设的影响出发,研究了长安城内甲第的规格、主人、特征及其对于唐代人文和地理环境的意义。他又有《隋唐长安的寺观与环境》(《唐研究》15),把隋唐时期的寺观放在环境史中进行考察,研究了长安寺观与周边地区人文、自然环境的关系。张永帅、唐亦功《唐长安住宅的规模》(《史林》2期)指出唐代长安住宅的规模由于种种原因而由大变小。王静《城门与都市——以唐长安通化门为主》(《唐研究》15)论述了长安外郭城通化门及其东面的章敬寺和长乐驿的社会功能,指出它们体现了一定的秩序和权力。介永强《〈唐长安佛寺考〉补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辑)在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的基础上,新增补唐长安及其近郊佛寺28所,并对某些佛寺的建置沿革问题进行了订正。毕斐《张彦远笔下的长安画家与画迹》(《唐研究》15)考察了张彦远的身世及其名作《历代名画记》中画家的分野和书中所描写的寺观等建筑的分布。韩香《唐代长安的旅舍》(《唐研究》15)论述了外地来长安的集散地、具有商业性质的公私旅舍的地理分布、经营性质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孙英刚《想象中的真实——隋唐长安的冥界信仰与城市空间》(《唐研究》15)研究了长安居民的冥界知识,特别讨论了西市的独柳树与东市的狗脊岭与冥界的关系、冥界空间与长安真实空间的对应。

历史地理。马强《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人民出版社)研究了唐宋人对于西部地理的认识,提出“民族地理体验”的概念,即唐宋人在民族地区的地理考察、民族文化感知与文化认同。周晓薇、王其祯、王灵《隋代东都洛阳城四郊地名考补——以隋代墓志铭为基本素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辑)对隋代东都洛阳城下辖的河南与洛阳两县所辖乡、里、村、原、园、桥、山、屯等地名,分门别类,稽考订补。李久昌《隋唐洛阳里坊住宅时空变化与环境的关系》(《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4期)认为隋唐洛阳里坊住宅呈满天星斗与局部簇群状分布,具有发展和分布两方面皆不平衡的特点。

郭声波《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四川大学出版社)

对以乌蛮为主体的古代彝语支民族 170 多个羁縻府州的具体位置进行了深入考证,基本复原了这些羁縻府州的建置沿革、交通格局、部族分布、分布范围及所在位置。李宗俊《唐代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再考》(《中国史研究》2 期)对唐代北陲所设安北、单于二都护府的建置沿革作了详细的论述,排比、纠正了史书记载和前人观点中的偏差。李志敏《唐安西都护“两四镇不同”问题述要——碎叶镇城地望考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 辑)认为“两四镇不同”是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镇治在焉耆国的碎叶城与焉耆城之间来回迁移的结果,“碎叶镇城”具体位置当在今焉耆回族自治县县城之所在处。艾冲《公元 7—9 世纪库布齐沙漠分布范围探考》(《唐史论丛》11 辑)研究了鄂尔多斯高原库布齐沙漠的空间演变。孙洪升《唐宋时期茶叶产地变迁考述》(《清华大学学报》4 期)指出唐宋时期贡茶的产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日趋缩小,茶叶产地分布格局由不平衡向平衡的方向发展。

## 七、中外关系史和民族史

中外关系。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是研究东亚世界国际秩序、文化交流的一部新作,从外交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古代与朝鲜、日本的关系。

朝鲜半岛方面,拜根兴的论著《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特别研究了唐朝与新罗在宗教、海事方面的来往。他另有《入乡随俗:墓志所载入唐百济遗民的生活轨迹——兼论百济遗民遗迹》(《陕西师大学报》4 期),论述了入唐百济遗民的流向和典型人物的生平事迹,描绘了他们逐渐融入唐朝社会的轨迹。金光明《金仁问前三次入唐考——兼与姜维东先生商榷》(《博物馆研究》1 期)则进一步研究了金仁问前三次入唐的时间,并与相关学者进行了商榷。

日本方面,金金花《日本遣隋使来华次数探究》(《黑龙江史志》21 期)认为日本遣隋使来华共有五次。刘恒武《五代时期吴越国与日本之间的“信函外交”》(《社会科学战线》1 期)纠正了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观点,认为吴越与日本国的“信函外交”肇始于日本左大臣的主动致函。

民族关系。王小甫《文化整合与吐蕃崛起》(《历史研究》4 期)指出,流传至今的吐蕃先祖神话和王朝成立前的历史,几乎都是松赞干布时代编写或借助本教进行改造的产物,并对本教传入吐蕃的时间和路线作了研究。陆离《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民族研究》4 期)研究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由落蕃唐人构成的行人三部落的演变轨迹,对其性质也作了定位。周毅《唐蕃舅甥关系述论》(《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 期)以舅权制为切入点,阐述了汉藏民族以儒家伦理为纽带,形成伦理体系的认同,为藏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感情基础和心理基础。

毕波《北朝、隋宫廷宿卫系统的粟特胡人》(《国学学刊》3 期)认为隋朝担任宫廷宿卫、仪仗之职的胡人明显增多,并与宫廷政治关系密切。崔明德《贞观年间关于安置突厥问题的大讨论》(《民族研究》2 期)探讨了唐太宗和大臣们分别在贞观四年、十三年和十八年就如何安置突厥问题展开的三次大讨论,指出了君臣论战对形成初唐民族政策的意义。他另有《南诏民族关系思想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期)一文。李鸿宾《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考



释——兼论唐朝胡人汉化的问题》(《民族研究》1期)指出穆泰家族的汉化有其自身明显的特征:在融入儒家文化圈的过程中还留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因子,这与进入内地核心区之鲜卑人汉化过程有着明显的区别。他的《唐末的形势与党项势力的崛起》(《宁夏社会科学》2期)认为,唐朝疆域和民族(族群)是由农耕地区、汉人为核心的内层与非农地区(牧业、半农半牧等)、非汉群体的外层结合而成的。安史之乱削弱了内层实力,致使外层势力上升,党项的崛起即源于此。谢思炜《白居易诗中的麽些史料》(《清华大学学报》4期)分析了白居易《蛮子朝》诗中的麽些族(纳西族)因素。

## 八、宗教

佛教。孟宪实《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3期)论证了唐朝政府管理佛教、道教的具体措施,即把原有编户齐民的方法运用到佛教的管理,厉行人身管理,从而完成了对佛教的全面控制。陆庆夫、魏郭辉《唐代官方佛经抄写制度述论》(《敦煌研究》3期)认为,唐代官方佛经的抄写有专门的组织,由官方寺院及僧人、官方抄经机构及地方政府完成。王翔《贝叶与写经——唐代长安的寺院图书馆》(《唐研究》15)研究了长安的藏经塔、翻经院等寺院藏书之处,探讨了图书馆和寺学的互动以及经藏的发展。季爱民《唐初密教佛经的翻译与贵族供养》(《唐研究》15)指出唐高宗时期长安慧日寺等民间寺院也出现了规模不小的译场,进而研究了其与国家大寺院译场的关系以及新经翻译完成之后引起的佛教与道教、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朱立峰《记智首、玄琬与唐初长安的守戒运动——兼论唐太宗崇重律僧与四分律宗之崛起》(《唐研究》15)界定了道宣时期的“律宗”,并分析了《四分律》在唐初长安的传播和智首、玄琬在律宗史上出现不同地位的原因。徐时仪《玄应〈一切经音义〉写卷考》(《文献》1期)研究了唐释玄应所撰《一切经音义》写卷与刻本的异同、源流关系以及写卷的学术价值。张勇《柳宗元〈大鉴碑〉中的“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5期)认为柳宗元在《大鉴碑》中有意避开“法衣”和“顿悟”两个字眼,是为了实现其会通禅宗南北的目的。段玉明《唐宋大慈寺与成都社会》(《宗教学研究》2期)认为中唐以降之佛教并非真如普遍所认为的随着八大宗派的衰落而衰落,而是以更世俗化的姿态完成了新一轮的信仰转型。杨俊《隋唐时期巴蜀藏传佛教之发展》(《中华文化论坛》3期)认为,隋唐时期巴蜀地区是藏传佛教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区域。朗达玛灭佛后,四川藏传佛教的发展成为卫藏地区乃至整个藏区佛教复兴的关键力量。

在敦煌佛教方面,杨宝玉《唐五代宋初敦煌尼僧史初探》(《五台山研究》2期)以P.3556尼僧邈真赞为例,勾勒出敦煌尼僧宗教修习与生活情况的大致轮廓。陈大为《晚唐五代宋初敦煌试经考略》(《兰州学刊》4期)对敦煌试经活动的主办者与参加者、试经活动的程序、所试经的内容和数量、试经活动的实际执行情况等问题作了考证。马格侠、杨富学《碑铭赞所见唐五代敦煌的禅宗信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1期)研究了唐五代敦煌地区禅宗的流行情况,指出当时人们信仰的既有早期般若禅学,也有北宗的渐悟、南宗的顿悟,而更多的则是南北宗兼修的敦煌本地禅学。杨宝玉《P.2094〈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题记的史料价值》(《甘肃社

会科学》2 期)认为唐末五代时曾有大量西川经籍涌入敦煌,《金刚经》经文的分段、添加分目,及据菩提流支译本增补鸠摩罗什译本等事件均发生于唐末五代时期,作者还提出并论证了金山国建立于 909 年的观点。她还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

道教。李平《晚唐道教危机探因:以宫观道教世俗化为线索》(《江西社会科学》2 期)指出,在晚唐道教危机中,道教的官方化、规范化与世俗化之间的联动关系是造成道教组织神圣性削弱的主要原因,而官方道教制度与修道者的实践之间的矛盾以及观念层面的变迁也促使了危机的产生。霍明琨《中晚唐道教转型时期的心性修仙观》(《史学集刊》4 期)指出中晚唐时期致仙理论的形成是因为在狂热炼丹的技术环节失败后而转向了注重心性。

其他宗教。葛承雍《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唐代景教经幢研究》(文物出版社)汇集介绍了新出土景教经幢的学术价值。其中《西安洛阳唐两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较研究》一篇(又刊于《文史哲》2 期)认为长安、洛阳都有景教的教区传播中心。严耀中《唐代的婆罗门僧和婆罗门教》(《史林》3 期)认为婆罗门教在唐代是作为一种独立宗教存在的。张乃翥《洛阳景教经幢与唐东都“感德乡”的胡人聚落》(《中原文物》2 期)指出,唐朝政府在洛阳城外东南方一带设立含有怀柔意味的“感德乡”,正是出于安置当地人口众多的胡人部落的需要。

## 九、其他

艺术。陈葆真《李后主和他的时代——南唐艺术与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研究了南唐绘画的艺术特色与成就。元娟莉《唐“胡部”乐考——兼及胡部与词体的关系》(《敦煌学辑刊》1 期)考察了唐代“胡部”乐的确立过程和特征。

史学。李伟《初唐史官对“文儒”的认识》(《山东大学学报》3 期)研究了唐初史官在《晋书》等史书中“文儒”的称谓,认为这种称谓既包含了文人人格的新趋向,同时兼具变革梁陈绮靡柔弱文风的意义。林晓洁《德藏吐鲁番出土宋版〈新唐书〉残片小考》(《文献》4 期)考证了德藏吐鲁番文书中属于《新唐书》卷 171《石雄传》的五个残片。史素昭《试论唐初八史对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湖北社会科学》2 期)认为唐初八史对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寓论断于序事中;叙事以简核为贵;描写战争惊心动魄。李南晖《作为国史材料的唐人偏记小说——以行状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4 期)则分析了唐代偏记小说进入唐国史的途径及原则,并以行状为例证,从记事原则、细节描写和情节编排、人物评价等方面考察了私记材料跟正史记录之间的内容取舍及行文差异。唐雯《〈两京新记〉新见佚文辑考——兼论〈两京新记〉复原的可能性》(《唐研究》15)从晏殊《类要》中汲取了《两京新记》的佚文,并探讨了《长安志》与《河南志》对于复原《两京新记》的重要作用。马铁浩《刘知幾以“例”论史》(《史学史研究》3 期)认为《史通》的史学评论中渗透了经学观念。

陵墓。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唐陵布局为切入点对唐陵制度进行探索,将唐陵布局的空间跟帝国的统治秩序相联系了起来。英卫峰、霍雅琴《试论唐昭陵陪葬墓区的“中轴线”》(《考古与文物》3 期)昭陵陪葬墓区的“中轴线”不是昭陵神道,而是唐代拜谒昭陵的御道,这条路线的确定,与唐代左文右武的制度有关。英卫峰、霍雅琴《唐代帝陵陪葬墓盛衰原因新探》(《西北大学学报》4 期)认为唐代帝陵陪葬墓数量自昭陵达到鼎

盛后遽然衰落的原因是陪葬制度的自身设计发生了变化。

另外,2009年还出版了一批与隋唐五代史研究有关的个人论集,如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广西师大出版社)、宁欣《唐史识见录》(商务印书馆)、黄纯艳《唐宋政治经济史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严杰《唐五代笔记考论》(中华书局)等,此处不一一列举。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出,政治史和经济史依然是研究重点。很多论者不仅研究了政治、经济制度的本身,而且注意到了人在制度运行中的作用。另外还发表了一批研究区域政治、割据政权的成果。礼制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祭祀礼仪方面。长安学异军突起,蔚然成风,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社会史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也比较全面。思想、文化史的侧重点在社会上层,对社会下层的精神状态则关注不够。宗教史方面,佛教的研究成果占据多数,道教和其他宗教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另外,军事史的研究成果也很少,寥若晨星。但总体而言,2009年是隋唐五代史研究收获颇丰的一年。

## 《容成氏》研究综述

孙飞燕

(清华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084)

《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中的一篇,整理者李零在简序编连和简文释读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该篇自发表以来,有多部著作和多篇文章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对学界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容成氏》公布不久,即有研究专著出版。季旭升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读本》(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中的《〈容成氏〉译释》部分,由苏建洲撰写,对《容成氏》做了题解、语译和注释的工作。邱德修《上博楚简〈容成氏〉注译考证》(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逐句注译简文,并探讨了其学术价值。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利用《容成氏》在内的出土文献,对传说时代的古帝王系统进行了研究。此外,还可参看李承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译注(上)》(载曹峰、李承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昔者君老〉〈容成氏〉(上)译注》,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5年)、苏建洲《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校释》(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的第二章《〈容成氏〉校释》以及王青《〈容成氏〉注释论说》(载杨朝明、宋立林等著:《新出简帛文献注释论说》,台湾书房,2008年)。除了专门的研究著作,还有多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对其进行研究。

以上是对综合性研究著作的大致概述,下面从《容成氏》的成书年代、篇题、竹简编连、文